

经济环境比赶超计划更有意义

Creating Better Economic Environmen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Surpassing the Plan

王则珂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广州 510275)

讲到经济发展,人们常常首先就想到赶超计划。宏伟、合理的赶超计划可以鼓舞人民,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意义。但是,各级政府和计划部门的主要精力,与其放在制定赶超计划上,不如用于建设良好的经济环境。

被忽略的广东“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之快世界瞩目。总结广东经验,可谈的东西很多,但是经验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广东是在经常需要辩解说速度不快的情况下,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如果把这一事实也称作“经验”,那么这就是一条被忽略了的经验。

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前,特别是在治理整顿时期,广东的发展速度常常受到“太快了”的批评。这里的同志,的确需要不断地作“我们的速度其实不快”的辩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快”的辩护,主要并不是隐瞒真相。各级政府和计划部门的确并没有什么要求高速发展的计划,只是经济环境好了,经济自己就会发展上去。难道非得把它压下去不成?确实,他们只是不舍得把速度压下去而已。

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快,不快”这种辩护性思维的痕迹。现在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的领导常说,只要社会效益确实好,产品卖得出去,有多高的速度就上多高的速度。这种说法,就具有答辩的味道,只是因为小平同志关于速度问题的讲话之后,不再回避高速度的可能。

经济环境的重要性

并不专门追求高速度,但是因为经济环境较好,结果却实现了高速度。这一事实说明,对于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

人类的经济活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要有适当的土壤、水份和阳光,经济之树就会根深叶茂,结出丰硕的果实。经济之树的土壤、水份和阳光,就是经济环境。

如果经济环境的概念还比较陌生,投资环境的说法大家一定熟悉。除了后者常专用于吸引外资的考虑以外,其实二者大体上说的是一回事。良好的经济环境,主要包括经济法制严明,价格市场形成和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完善。

搞市场经济,绝不等于政府就无所作为。首先,政府应为整个经济的运行设立框架或制度。其次,只有在政府不但积极参与,而且强有力地导演的情况下,才能建设起良好的经济环境。

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政府做企业做不到的事情,上级政府做下级政府做不到的事情。经济环境的建设应是政府的头等大事。

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

如果说发达的市场经济对自主的企业既是激励又是约束,那么这首先要明确的和受保护的产权。利润是企业的主要激励,而产权就是对利润的索取权。如果产权不明确,辛苦了半天,好处可能却被别人拿走,利润也就不成其为激励。同样,如果产权得不到保护,经济合同没有法制的维护,当事人就要陷入没完没了的经济纠纷,导致交易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市场经济的效率也将丧失殆尽。我们经济生活中说不完的扯皮现象,全国累计总额以千亿元计的三角债,都说明我们的经济法制化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产权不明确,法制不健全,对于经济的影响,轻则大大增加交易成本,重则导致对经济的破坏。这绝不是危言耸听。1992年8月举世闻名的“红旗渠”

被炸案,以及 1993 年 1 月在广东号称南国第一名胜的“凌霄岩风景旅游区”被炸毁,都是产权纠纷调解仲裁不力的结果。

上述破坏性例子自然触目惊心,容易惊人,之后往往被忽视的,可能是对“重合同,守信用”的精神以及商业信誉的漠视。必须明白,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建立严明的经济法制,是利益主体多元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经济运行法制化的要求。经济运行法制化要求可靠的合同信誉。我国由于千百年来都是人治的社会,缺乏法制的传统,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们在立法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极其伟大,但是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离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还有相当的距离。有些外商基于个别经验甚至说,和中国人谈判,签定协议可能只是新一轮谈判的开始。这当然是很个别的现象,不能以偏概全。但是这样的现象确实存在,是经济环境的破坏因素,值得高度重视。如果没有良好的商业信誉,经济就无法平稳顺利地运行。

价格的市场形成

商品价格确定的理论基础属于价格机制问题。传统的理论,信守商品价格的轴心取决于为生产该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决定论”,拒绝接受以供不应求时商品价格上升、供大于求时商品价格下降为主要内容的“供求决定论”,把这种符合现代经济学关于价格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性的原理,并且人民大众在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也很容易形成的正确见解,贴上“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理论”的标签。由于这种僵化理论的误导,以往的价格政策总是要求按照成本加成来确定商品的市场价格。

但是,所谓良好的投资环境,除了人文法治和基础设施这样的“支持系统”以外,最主要的恰恰就是商品由市场定价,或者说企业自主定价的价格机制。市场竞争,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要商品能迎合或激起市场需求,哪怕不包含多少劳动价值,也能实现很高的市场价格。如果一定用成本加百分之多少利润的尺子去限制,人家就不会来投资经营。并非人家无法无天,只怪我们作茧自缚。是彻底打破枷锁,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时候了。同样,国内企业所要求的,也正是这种平等的竞争环境。如果产品的价格不是依据其市场实现,而是由别人规定,那么企业家的精神激励就失去利润追求这个最重要的组成。

强调价格的市场形成,并不是说国家可以放弃对价格的管理。即使将来市场发育得比较好了,国家对价格的管理也是需要的,但管理的重点是在授

权专营的、对于国计民生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以及市场本身不能正确给予评价的教育、科学、文化、国防等关系国家长远利益的事业。这牵涉过度竞争造成资源浪费和市场力量的盲目性等问题,值得另文加以剖析、探明。这里仅指出一点,价格管理也包括必要的价格支持。以教育事业为例,民族素质的提高,专门人才的培养,周期都很长,教育劳动的价格,如果失去国家的支持,任由市场去定位,那么等到我们的社会和市场成熟起来,可能已经损害了整整一代人。

基础设施必须超前规划

能源、交通、电讯,都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决策中,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十分不足。这就造成基础设施严重薄弱,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以铁路为例,本来,铁路是现代工业的先驱。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都曾高强度地投资于发展铁路,投资额可达全国总投资的一半甚至更高。反观我国,在重生产轻流通、重工业轻交通的思想约束下,40 年来对铁路的投资从未超过全国投资额的 15%,而且逐年下降,1991 年降到 5% 的最低点。现在,不要说与发达国家相比,就是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也落在后面。仅以铁路运力严重不足引起的能源短缺而言,国家每年损失的产值近 4 000 亿元。

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讨论,本质上更接近于做预测。政府部门要在科学地预测经济发展规模的基础上,超前规划和建设基础设施。在这个问题上,市场力量常常表现短视。如果等待市场力量对基础设施的自发激励,必然导致基础设施的建设严重滞后,拖经济发展的后腿。在谈到公路建设时,广东省中山市的同志说,小修小发财,大修大发财,可见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意义。预测和计划当然很有关系,但是毕竟不是一回事。科学预测基础上的环境规划和环境建设做好了,经济必然起飞。相反,如果对经济环境重视不够,再鼓舞人心的计划也有落空的可能。

把着眼点移过来

着眼点放在赶超计划还是放在经济环境上,脑筋动得就不一样。前已指出,现在不少人说,只要社会效益确实好,产品卖得出去,能有多高的速度就上多高的速度。这样的说法,虽然相当朴素,虽然略显“模糊”,不象多少年赶上什么国家或地区那样明快醒目,但是仍然比较合理,比眼睛只盯在计划指标的计算上,是一个进步。如果再进一步明确把着

(下转第 59 页)

这里的法是指宏观的国家法。在农村内部,农民们正在建立一套适合自己单位需要的法,其基础就是自己的本位。而这种从本位出发的法往往与国家法律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解决将是整个国家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交易行为不规范。这在后起的农村和乡镇企业中表现尤为明显。发达的农村和乡镇企业把交易中人的行为都视为一种交易行为,并标明一定的价格,而后起的农村和乡镇企业仍依靠乡情和人情来进行交易。其结果是与客户发生感情和观念的冲突,造成许多矛盾。市场体系要求交易双方以自己的最大利益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交易,对此双方应当相互默契。目前,有相当多的农民不了解这一点。对于最先起步的农民来说当时各种行为没有进入市场,单凭人情和乡情也可以帮助农民解决一些问题,如计划内原材料、项目等,进入市场体系后,后起的农村必须调整自己的交易行为的选择,以面对严峻的挑战。

缺乏良好的公关形象。这是部分农民致富后的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由于经济上获得一定的成绩,某些企业家自傲自大,与周围的群众和上级主管部门发生冲突,关系紧张,给自己的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当然,这个问题有两层含义:乡镇在壮大之后,摆脱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干预是企业走向市场的重要一步,有重要意义,这一点不能否认,但与社区及社区政府关系紧张不能不说是企业缺乏公关能力的表现,而公共关系的建立是市场经济所不可缺少的。中国目前已经有数十个亿元村,它们都是当地的明星,也是当地政府对外宣传的对象,对于他们来说,在今后一个时期,谁掌握住了与周围的公共关系,谁就掌握了未来。掌握与不同层面的人打交道的技巧,并使自己处于良好的公关环境中,是新一代农民成熟的标志之一。

五、农村社会变迁与变革的方向

中国农村未来的方向取决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变革以及对于这种变革所采取的形式。几乎所有的农民企业家都在探讨这一问题,因为他们被寻求新的发展的思考所困惑。迈出大步的农村在探索,正

在迈步和没有迈步的农村也在探索,这就是中国农民正在进行的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国农村社会和文化的变革方向就隐含在农民企业家们一系列的探索活动之中。问题在于怎样给农民提供一个利于创造的宏观环境和农民自己如何去争取一个利于创造的环境。这在目前是极其重要的。

要着力培养一代农民企业家。农民企业家是农村社会及文化的体现,他们代表着农村文化的未来。政府应当放手让他们积极探索,对于他们的创造行为要热情支持,要相信农民的创造性。对于政府来说,这一点十分重要。许多政府官员和文化界人士尽管也承认农民的创造性,但在骨子里依然没有摆脱“农民是一个保守的阶级”的心态,对于农民的每一个创造总是持怀疑态度,对于农民的每一新的举动,每每认为是“越轨”和“傲气”。从根本上转变对农民的看法是农村发展所必需的宏观环境之一。这实质上已经说到了农村新文化与中国整个传统文化观念的冲突。

应当重新审视目前农民行为与现存文化和体制的冲突。不能把所有的冲突都归咎于农民阶级的落后性。严格来说,这种冲突中的相当一部分实质是农民的市场行为和计划体制的冲突。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某一名村来了几位要员达官,村支书拒不会见,但却对来村参观的农民企业家热情接待。他的行为被官员们说是“傲气”。说穿了,这是农民对于政府摊派行为的一种反抗。对于此类问题,无论是理论界和管理界都应当重新审视。这种冲突是中国旧文化与现代市场文化和市场体系与管理体制的冲突。农民阶级正在进行着艰难的探索。

中国农民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被文化理论界重新认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被一部分所谓“现代文化人”误解。“痞子”运动是这部分文化人的内心对于农民评价的积淀。而这也是他们得不到农民支持的原因所在。所谓“没有用”是农民企业家对着一批文化人说的,因为他们脱离实际。农村社会发展、变迁、创造新文化需要文化人的共同努力,他们需要自己的代言人。而中国文化和文化理论的前途也在农民和文化人共同努力之中。

(责任编辑 孙立明)

(上接第8页)

眼点放在经济环境的建设上,明确良好的经济环境可以引导市场力量演出有声有色的活剧,实现真正的经济起飞,那将是思想的另一次飞跃。经济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土壤。政府部门和计划工作者不把着眼点放在经济环境上,弄得不好,会做出破坏经济生态的,甚至拔苗助长的蠢事。

一种是整天想着赶超计划;第二种是只要效益

好,有多快就多快;第三种是把着眼点放在经济环境的建设上。这似乎是经济工作思想方法三个不同的境界。看起来越是不那么急功近利,实际经济效益可能越好。我们希望,有关部门会给经济环境更多的注意。广东省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不快,不快”的辩护之下,实现了高速增长。这一事实,很有一点经济学辩证法的哲学道理。

(责任编辑 蔡德诚)